

# 休闲农业视域下的村民参与和资源再生研究

## ——以川西平原 H 村为例

郑硕夫<sup>1</sup>

**【摘要】**针对当前中国休闲农业的发展潜力与研究局限，基于内部视角，以川西平原 H 村为例，展现村民参与休闲农业时不断增强主体意识的过程，并通过分析村民对村庄组织、文化和生态资源的再生产，探寻 H 村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依靠资源再生不断为发展休闲农业提供地方智慧，村民在参与休闲农业的过程中可实现从浅层在场到深度融入的转变，地方资源也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H 村结合村民参与和资源再生的休闲农业发展路径，对分散型村庄转化地方优势、重建村庄共同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村民参与 资源再生 休闲农业 川西平原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70(2021)-07-0112(08)

### 一、问题引入与文献概述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的休闲体验，无疑是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人与社会的全面充分发展。中国丰富的农业遗产，既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体验田园文化、追寻记忆乡愁的休闲载体，又蕴藏着优化传统农业结构、融合农业与旅游业、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巨大潜力。因此，休闲农业不仅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新领域，而且是休闲产业发展的一种新业态，可以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新兴支柱产业。近年来，中央多部门相继出台《关于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大力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通知》和《关于大力发展休闲农业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彰显出国家层面对休闲农业的重视。

基于此，休闲农业近年来也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针对休闲农业的内涵和价值等抽象层面，范水生和朱朝枝通过梳理休闲农业的相关概念，提出休闲农业是基于“三农”、融合“三产”、兼具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新型农业形态，并从资源基础、经营内容、服务宗旨、体验价值、产业提升五方面诠释了休闲农业的内涵；<sup>[1]</sup>陈良兵从生态、消费、审美和文化遗产四个维度，指出休闲农业是农业生产方式的新载体，有助于摆脱消费社会对人的异化，体现了人向自然的诗意回归，承接着东方农耕文明的血脉。<sup>[2]</sup>关于休闲农业的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休闲农业的空间优化、模式类型、游客满意度等方面。而地方文化对休闲农业的影响，也受到部分研究者的关注。如杨载田和王志坚探讨了湖南长寿文化与当地发展休闲农业的关系；<sup>[3]</sup>杨大蓉论证了如何整合苏州农产品和农业民俗资源，以服务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sup>[4]</sup>

可以看出，学界多采用外部视角分析休闲农业的概念、模式和问题，聚焦休闲农业的发展趋势、需求主体及空间结构，而对参与休闲农业的村民本身关注不够，也对地方内部资源如何通过休闲农业获得再生缺乏必要的审视，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回答谁是休闲农业的主要依靠力量？休闲农业给本地人带来了什么？以及地方性资源如何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正如有学者借鉴西方“内生发展理论”指出，持续实现乡村振兴，需通过整合内外资源，让当地

---

<sup>1</sup>作者简介：郑硕夫 博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喀斯特地区民族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编号：18YJC850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居民更好地参与其中来不断激发其对乡土的认同，以避免过分依赖“制度激励”“投资激励”和“项目激励”等外部力量推动休闲农业。<sup>[5]</sup>

自古以来，川西平原<sup>①</sup>农耕文化发达，休闲氛围浓郁，改革开放后诞生了中国首批农家乐，近年来通过整理修复林盘聚落、自流灌溉、水旱轮作等农业遗产，积极打造一批以农事体验为核心的休闲农业目的地，助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和休闲经济提档增速。众多农户在经营休闲农业的过程中，主体参与性不断增强，对地方资源的时代价值也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和利用。因此，从川西平原发展休闲农业的内部视角入手，探究村民在休闲农业中的主体参与，以及地方内部资源借助村民参与实现再生产的路径，我们可以更为全面认识川西平原休闲农业的特点进而为当下中国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值得参考的地方经验。

## 二、案例引介和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案例 H 村位于成都西郊 P 区，距成都城区约 20 公里。截止 2019 年底，该村共有 11 个村民小组，932 户，常住人口 2200 余人，面积约 2.4 平方公里。由于地处所在乡镇的边缘，道路交通不便，H 村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发展都相对滞后。2012 年，H 村成为成都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中的一员。遵循“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的建设理念，2000 多名村民按照村民小组相对集中的原则，被就近集中安置于 9 个间隔农田的聚居院落中，搬进了带有川西田园风貌和民居特色的两层小楼。为充分利用村民集中安置后结余的 305 亩集体土地，村集体综合大家意见，于 2014 年联合具有乡村旅游运营经验的本地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一家独立运行的平台公司，将 H 村部分区域打造为休闲农业景区。经过 7 年发展，H 村休闲农业颇具规模，踏青节、油菜花节、稻鱼节、丰收节等带有地方特色节日已成为该村名片。

选取 H 村作为研究对象，笔者主要出于以下考虑。首先，该村在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以来，迅速从一个传统农业村转变为以休闲农业为特色的城郊村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其次，据村委会统计，2019 年底该村休闲农业的从业人数约 900 人，其中 560 名为本村普通村民，说明该村休闲农业的村民参与度较高；最后，该村近年来积极探寻川西平原水乡文化、林盘景观、农耕传统、互助组织等多重内部资源的再生机制，助推当地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的内部视角。在研究思路，本文从村民同平台公司的关系入手，梳理其参与休闲农业的阶段、变化和特点，然后通过挖掘村民如何再生当地内部资源，拓展到对 H 村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之多重路径和地方经验的深入探究。2020 年 7 月至 9 月间，笔者在 H 村共进行了 30 余天的实地调查，通过与部分村民<sup>②</sup>的非正式谈话和深度访谈，从村委会、平台公司和村史馆等地搜集而来的统计数据、规划文本和宣传文册材料，以及参与观察当地围绕休闲农业而开展的一系列主题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资料，希望以此为蓝本，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部分写法，从内部视角呈现 H 村发展休闲农业的路径和启示。

## 三、村民参与：不断彰显的主体意识

H 村村民参与休闲农业中的过程，从最初被动配合平台公司和村两委，到自发自觉投入其中，体现出不断增强的主体意识。H 村的休闲农业逐渐步入正轨、壮大规模、提升质量，但也面临着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冲击，急需转型升级。

### 1. 观望与配合

根据 H 村 2013 年编制的村庄规划图可知，该村很早便萌生了发展休闲农业的愿景，但在新村建成伊始，村民们对发展休闲农业的具体方式和依靠力量还是一头雾水。由于 H 村地处成都近郊，村民新聚居点又位于主干道旁、交通便利，从 2014 年开始，节假日便陆续有城里人前来休闲观光。随着游客的增多，村庄暴露出服务设施滞后、接待能力不足等问题。一方面，漫步于田园花海中的游客，在观赏风景之余缺少其他的休闲方式，难以深度感知村庄的底蕴；另一方面，村民除了做一点针对游客的小

<sup>①</sup>川西平原又称成都平原。广义的川西平原，包括北部涪江冲积平原，中部的岷江、沱江冲积平原，南部的青衣江、大渡河冲积平原。狭义的川西平原，仅指以都江堰、绵竹、罗江、金堂、新津、邛崃 6 地为边界的岷江、沱江冲积平原。本文所提川西平原为狭义。

<sup>②</sup>在文中以字母 R 指代。

---

买卖，也缺少进一步参与休闲农业的途径。村民 R1 回忆，当时 H 村虽然环境很美，但因为服务跟不上，游客们想要如厕和寻路时都颇为不便，更别提那些想要在 H 村就餐和入住的客人了。

虽然在平台公司的统一管理下，景区的服务和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H 村的美景和活动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更好的宣传，但村民参与休闲农业的途径依旧有限，主要在平台公司从事保安、保洁、收银等工作。这些岗位，一方面收入不高，可替代性较强，无法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另一方面也难以让村民在参与休闲农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进而突出 H 村休闲农业的特色。因此，村民大多还是以就近外出打工谋生，未能成为景区休闲农业的参与主体。

## 2. 投入与合作

当 H 村引入平台公司经营休闲农业后，如何让村民更好地参与其中，而不是仅仅在平台公司内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成为村干部急需解决的问题。诚然，平台公司的专业化属性不便于其在公司内部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但并不妨碍它积极调动村民发挥自身优势进行自主创业，从而在双方的合作中将 H 村的休闲农业做大做强。村里的部分有识之士也认为，“被动看”不如“主动干”，准备从平台公司无法顾及到的游客需求入手，抓住他们游览观光时的痛点寻求更多商机。

2015 年，几位村民发现，前来游玩的老人和小孩在景区步行时常常十分疲惫。倘若遇到烈日或者风雨天气，游客则会因扫兴而归而降低游览的满意度。为了让游客在景区更为从容惬意，他们合伙购买了几辆可乘坐不同人数、装有遮阳棚、用于景区骑游的自行车，将其租给有需要的游客。骑行在花海、麦田、绿道之中，游客们获得了不一样的游览体验，也有更多机会与亲朋好友沟通感情，所以车辆一时间广受追捧、供不应求。许多村民看到有利可图，也购买车辆做起了租车生意，几位经济宽裕的村民还合伙购买了游船，方便游客泛舟湖中。随着车船租赁业务的不断扩大，村民主动请求平台公司统一对其进行管理，以规范经营秩序和更好地吸引游客，平台公司也因为可以收取部分管理费用而乐行此事。在双方的合作下，平台公司对车船进行登记和装饰，为其专设停放点和宣传指示标识，车船的所有者则轮流负责日常经营。如此一来，村民参与休闲农业的积极性大幅提升，成效显著，也让平台公司和游客受益。

而更多村民则通过经营农家乐参与到 H 村的休闲农业中来。村民 R2 告诉我，景区刚建成时，游客们很难找到吃饭喝茶的地方，又不能违反规定在景区随意野餐、烧烤，往往只能成为孤独的赏景者，难以同亲朋好友享受聚餐之乐。于是，在村干部的号召下，部分村民从 2015 年开始，陆续在自家屋前的空地摆起餐桌、茶几，撑起雨棚，经营起农家乐生意。

由于 H 村在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中，注重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留了许多川西平原的田园风貌，使得一大批渴望品尝农家美食、体验乡村生活的游客慕名而来。从最初为了解决游客的就餐难题，到逐渐成为景区的特色招牌，农家乐经营在 H 村发展得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其中。总体而言，H 村的农家乐多以共同居住的小家庭为经营单位。当工作日游人较少时，农家乐一般由家里老人负责张罗。待到周末和节假日，休假在家的年轻人便成了农家乐的主心骨。如果客人太多，家里人忙不过来，他们则会请一些亲朋好友前来帮忙。因无需支付房租和雇员报酬，日常经营由家庭成员负责，这些农家乐的消费相对亲民，能最大程度地体现经营者的个性和情怀，便于通过回头客积累口碑，同游客建立一种稳定而长久的互动关系，同时也能在家庭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增强家庭成员间的代际合作。

然而，这种小家庭式的经营单位，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如个别经营者会以低价争抢已经预定其他农家乐的客人，导致接受预订的农家乐商家因提前准备好食材而蒙受损失。此外，农家乐之间公共区域的治理，也成为景区休闲农业的一大难题。而平台公司通过统筹管理，建立农家乐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协商机制，统一打造 H 村农家乐的景观和品牌，不仅有效解决了经营失序和公共区域缺乏治理的“公地悲剧”，还让村民间形成了荣辱相连的共生关系，保障了该村休闲农业的整体利益。据 H 村统计资料显示，2019 年底，景区农家乐多达 120 余家，农家乐年收益超过 1700 万元，实现休闲农业总收入 1.5 亿元，连续 4 年呈增长态势。

### 3. 困境与出路

2019 年, H 村所在的 P 区以“全域旅游+”理念为指导, 编制《P 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着力打造“一廊两片六区”和“三纵四横五组团”的全域旅游空间格局, 与 H 村类似的特色村落在其周边相继兴起, 且各有亮点, 为人们的日常短途休闲提供了更多去处, 自然也对 H 村的休闲农业造成一定冲击。正如村民 R3 所言, 游客往往喜欢尝鲜, 热衷游览一些从未去过的新景区。不过, 由于部分村民对市场预判的滞后, H 村的农家乐的数量仍持续增加, 使得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因缺少回头客的光顾, 一些新开的农家乐生存空间尤为狭小, 只好牺牲菜品和服务质量, 以低价策略吸引游客。2020 年伊始,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经营者错过了春季这一休闲农业的旺季。虽然到五月初景区复开时, 游客数量恢复缓慢, 但仍有部分农家乐经营者无奈关门歇业、另谋生计。农家乐的萧条使得平台公司收入锐减, 疏于对景区环境和服务的管理。个别村民对此颇有怨言, 认为平台公司未能在 H 村休闲农业遭遇困境之时维护经营者的利益, 而是只顾收钱, 对景区休闲农业的发展也缺乏有效监管和长远规划。

可见, 面对休闲农业的经营困境, 村民与平台公司间的合作关系出现了裂痕。这种矛盾背后, 实则反映出村民主体参与性的不断增强, 他们不愿再受制于平台公司的单向管理, 而是渴望拥有更大的话语空间和参与平台。例如, 村民 R4 对一位村干部卸任后在平台公司负责管理工作表现出极大的肯定, 认为此举可以更好地维护村民利益。这同样反映出, 通过数年的经验积累, 村民对如何利用本地资源和自身优势经营休闲农业, 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 希望将当地特色资源再生产为休闲农业可资利用的财富, 从而逐渐摆脱对平台公司的过分依赖, 不断激发当地休闲农业的特色和韧性, 从村庄内部为当地休闲农业的发展寻找更多转型的可能, 也让自己在参与中实现由浅层在场到深度融入的转变。

## 四、资源再生：不断涌现的内在价值

与作为外部资本和推力的平台公司不同, 村庄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传统文化、民众活动均可被视为村庄的内部资源, 它们生长于当地的社会土壤, 不仅更贴近村民的日常生活与情感诉求, 还能再生为当地休闲农业的特色卖点, 进而丰富游客的休闲体验, 增强村民的创新意识和文化认同。因此, 在内外环境的倒逼下, H 村村民不断扭转对游客休闲行为的固化认识, 集中挖掘和系统展示村庄近年来在打造田园综合体过程中的具体经验和实践成果, 让游客除了赏景、聚餐、游玩、拍照, 还能在休闲度假中感受到村庄的文化底蕴和时代新貌。当前, 虽然村民记忆中的 H 村逐渐模糊, 但他们依旧在日常生活中, 基于川西平原的乡土底色, 用实践智慧延续和转化体现当地特色的组织、文化和生态资源, 以向内而生的努力, 不断增强自身在休闲农业中的主体参与性, 让村庄内部资源的价值不断涌现, 从而助推该村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1. 组织重建与主体凝聚

清代以来, 相对稳定的气候环境和完善的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统让不断涌入川西平原的移民形成独立生产、随田散居的林盘聚落自组织体系, 家族观念也淡于华南和华北农村。<sup>[6]</sup>林盘系统内部一般包含由三五户人家组成的院落组团, 他们往往不是近亲或姻亲, 只是单纯的邻里关系。传统上, 当地农户遇到农业灌溉、建造房屋、婚丧嫁娶等单户人家难以解决的大事, 大多本着互惠与交换的原则, 通过邻里合作完成。<sup>[7]</sup>因此, 集体化时代川西平原的基层治理单位——村民小组, 便作为村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元, 一直处于“在场”状态, 通过强调邻里团结来回应村民的“社区公益性需求”。<sup>[8]</sup>当 H 村村民的居住空间从散居转向组团式院落小聚居之后, 村民小组便为各种强调邻里互助、院落自治的组织形式奠定了基础, 通过不断增强村民的共同体意识, 实现“以自治促进共治”的目标。

2017 年, H 村在 9 个院落分别成立了院落自治委员会, 由村民投票选出认可、信任的院落长和楼栋长, 作为村民小组的补充。在院委会的组织协调下, 村民定期交流经验、商讨公共事务, 制定了《H 村幸福手册》《H 村文明公约》等新的乡规民约, 成立了非赢利性的物业互助社, 通过微信群等新媒体进行自我管理与服务。2019 年, H 村以“一家人·一家亲”理念为指导, 主动对接 P 区社治委和 P 区某社工服务中心, 成立 H 村志愿者协会, 积极组织号召村民参与各项公益活动。两年多来, 志愿者

人数不断增加,现已占到村民总数的 1/10,且跨越各个年龄段。另外,相继成立的青年促进会、乡村旅游合作社、老年人舞蹈队等自治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文体、环保、互助、经营活动,不断激发村民的公共精神和自主意识。

通过重建基于林盘聚落、邻里互助和村民小组的传统组织形态,村民为 H 村的休闲农业持续贡献组织潜力。例如,在志愿者协会的组织协商下,H 村南北片区的村民相互分享经验,不仅逐渐消除双方前几年因休闲农业发展不均衡而积累的矛盾,而且对未来南片区主推乡村康养和文化体验的高端休闲农业、北片区深化以农家乐为特色的平民化休闲农业这一规划蓝图达成共识。在 2020 年 9 月的丰收节上,村老年人舞蹈队和青年促进会以村民为主体,编演了丰富多彩的文娱节目回馈游客,虽然专业程度稍逊于平台公司从外面所请的演出团队,但更为真实地展现出村民的生活面貌,反而对游客有着更强的吸引力。此外,村志愿者协会在丰收节期间,通过筹划举办“H 村第一届荧光夜跑活动”,让村民和游客借助大众健身的契机进行互动,无疑成为 H 休闲农业的另一亮点。而由 30 多名村民出资入股成立的乡村旅游合作社,在疫情期间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推介 H 村的乡土特产,充分发挥了新兴组织在休闲农业中的经济效益。总之,通过将组织重建介入休闲农业的转型之中,H 村形成了更为紧密的主体凝聚力和村庄认同感,进而为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更多内部资源。

## 2. 文化再造与价值重现

赵旭东指出,乡村文化再生产除了可以创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亦能让广大农民认识到乡村文化的自身魅力、独特优势和发展前景,形成“乡村文化自觉”。<sup>[9]</sup>若我们在乡村建设中,将这种文化自觉通过以村民为主位的社会参与,联系起历史文化资源与鲜活记忆遗产,便能最大限度彰显乡土社会的文化价值。<sup>[10]</sup>因此,通过村民的主体参与将 H 村的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休闲农业的文化资源,是重现川西平原乡土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

据 H 村村史记载,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毗邻河道、位于几个乡镇接壤处的 H 村,曾是许多来往船只的停泊处,客栈、酒家、商铺林立,各色人群汇集,集市贸易发达。从金堂赵镇开来的商船,逆水而上,将烟叶、黄糖、桔子等农副土特产带到郫县,然后装载着大米、豆瓣等顺流而下。如今,饱经风霜的老桥、老街、敬老院、供销社、电影院和老标语,虽然布满尘埃、稍显落寞,但依旧透漏出码头过去的繁华,不失文化底蕴。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承载着村民集体记忆和情感认同的村落意象,若能通过村民的主体参与再生产为吸引游客的地方性资源,必能为 H 村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新机遇。目前,H 村的乡村旅游合作社正与成都某高校联手对老街进行升级改造,计划依托码头文化景观,将其打造为充满川西水乡风情和田园风貌的休闲商业街,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消费增长点。

另外,流传于村民生活中的故事、民俗,或者村民日常生活本身,作为一种无形文化资源,同样在当地的休闲农业中拥有被再生产的价值。例如,村里老人关于熙攘码头、村庄大火、影院盛况的历史记忆,正月十五村民到邻居家菜地“偷青”以求福气的习俗,便可以被打造成吸引游客的文化符号。而“一家人·一家亲”等活动对川西平原互助文化的传承,村里院落家庭茶馆所营造的休闲氛围,以及村民在房前屋后栽种果蔬的农耕惯习,无疑也是丰富当地休闲农业样态的可贵资源,可以让游客透过它们感受村民的本真生活和找寻记忆中的乡愁。在文化再生的进程中,休闲农业的参与主体还由村民扩展到从外地来村居住的新村民,如画家、摄影家、商人、退休干部,他们不仅为 H 村的休闲农业贡献了社会文化资本,同时也再现了 H 村在新时代田园综合体建设中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

## 3. 生态保育与家园美化

体验休闲农业的游客,除了追求口腹之欢和乡野之乐,还在乎田园之美。诚如彭兆荣所言,只有如“理想风景画”般的乡村才能吸引游客,使其不仅能够穿行于“乡村空间”,更能在“乡村概念”中体认一种异于都市的价值”。<sup>[11]</sup>而乡村的生态资源,无疑是其美学价值的重要来源。星罗棋布的田块、散落田间的院落、蜿蜒的小径溪流,错落有致的植被,塑造了川西平原林盘景观的独特韵味。H 村村民保育当地生态景观的实践,让家园的美学价值不断彰显,为休闲农业的转型贡献着地方智慧。具体来说,其通过挖掘水乡生态资源、传承农耕生活样态、美化人居和公共环境,不断增强当地休闲农业的美学吸引力。

位于岷江中游的川西平原，河网密布、水系发达，千百年来在都江堰的庇佑下，少有水旱灾害，属于典型的“丰水型社会”。<sup>[12]</sup>水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也可以成为发展休闲农业的重要资源。在传统社会，H村及周边村落诸如泼水、划龙舟、抢水鸭、抢尿脖、观鱼会、鱼鹰表演等地方习俗与水密切相关。而在建设新农村综合体的过程中，H村注重保护和突出水乡底色，如规划打造沿河生态休闲景观带，串联起成都的绿道体系；将连片低槽田地改建成生态湿地，使其兼顾排水、灌溉和种植功能；修筑人工水渠引水入院，延续“水田绕屋”的林盘记忆；新建大型污水处理厂以改善成都母亲河的上游水质。漫步村中，我们时常遇见在水渠边洗衣淘米的村民，享受着人水相依的亲密关系，言语间充满了对地处成都上风上水地带H村的啧啧赞意。另外，许多看重当地良好水质的城市老人，近年来纷纷来到H村及附近村庄安享晚年。毫无疑问，H村充满自然和人文之美的水乡生态资源，在村民参与休闲农业的实践中大有作为。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水不仅是他们生活的朋友，更是他们致富的帮手，因此积极打造多项以水为特色的文旅项目，新建稻、鱼、虾共生养殖基地，复兴与水有关的民俗节庆。而村民依托水乡生态底蕴的用水、护水、玩水行为，无疑也是休闲农业中颇具地方美感的生活景观。

自古以来，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川西平原农耕文化发达，和谐宜人的田园风光代代相续。为了延续田园景致，H村在新村建设初期便定下了“不损田园肌理，不伐成型树木”的原则，积极融合人造景点和自然风貌。而村里新建的川西民居，在完善现代生活设施的同时，又不失“林院相依、院田相连、田水相映”的林盘基因。为了尊重村民的农耕习俗，村里鼓励村民在自家房前院后栽种蔬菜、水果、花草，让当地的农业生活样态不会因村民生计方式的变迁而消失。如今，利用闲暇时光打理自家菜地的村民，不再将务农视为一种负担，而是通过其调节生活、美化家园，这恰恰契合了休闲农业的理念，值得成为H村休闲农业的一道别样风景。而近年来村里组织村民收集生产生活农具、建立农耕博物馆、邀请大师指导游客学习体验川西传统农耕技艺、统一包装当地特色农产品等举措，同样有助于将农耕传统转化为发展休闲农业的生态资源。

在生态保育的过程中，H村志愿者协会通过成立环保小分队，引导村民逐渐改变过去不良的卫生习惯，不断增强环保意识。每月，环保小分队都会组织村民在全村进行大扫除，监督农家乐经营者不要乱搭乱建、随意排污。村民也慢慢意识到优美的生活环境，不仅有助于大家的身心健康，还能对游客起到更强的吸引作用。如今，部分村民不再一味用低价策略招揽游客，而是想方设法美化自己的房屋院落，突出干净、舒适、个性化的卖点，以此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另外，越来越多的村民依靠各种互助模式，解决公共空间的环境治理难题，如部分村民自筹资金修建垃圾分类站和油污分离设施，用以处理农家乐商家的餐厨垃圾。日前，H村一项基于家园治理和产业服务的公共空间互助项目，便成功获得P区社治委13.4万元的项目金资助，必将为该村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

## 五、结论与反思

综上所述，村民参与和资源再生，方可保证H村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诚然，通过同平台公司合作，村民获得了参与休闲农业的良好媒介，不断增强自身的主体能动性。不过，当H村的休闲农业遭遇外部环境冲击时，过度依靠作为外部推力的平台公司，其实不利于整合当地内部资源、将其转化为村庄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因为村庄的组织、文化和生态资源，与村民的历史记忆、社会网络和价值情感息息相关，终究为村民所传承和共享。而通过组织重建、文化再造和生态保育实践，村民逐渐实现主体凝聚、价值重现和家园美化，为H村休闲农业注入更多的民众热情和本土智慧，也为新时代下村庄内部资源的再利用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积极探索平台公司以外的内部资源再生机制，既有助于参与休闲农业的村民实现从浅层在场到深度融入的转变，亦能让村庄的内部资源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随着村民参与和资源再生的不断深化，平台公司也逐渐意识到地方知识和主体实践的内在价值，开始以村两委为纽带，尝试与村民建立各种协商平台，希望以此让双方在H村发展休闲农业的过程中实现更为长久的合作共赢。

当前，中国许多村庄在发展休闲农业时，往往过分依赖外部资本，较为忽视村民的参与主体性和村庄的内部资源再生。许多休闲农业景区成为资本和权力按照商品化逻辑所规划的“制造景观”，沦为与当地入毫无关联的“飞地”。<sup>[13]</sup>邱硕认为，这种“制造景观”背后实则反映出城乡权力的不对等以及基层公共事务中官民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乡村抛弃某些有价值的农业遗产，委身迎合自己对城市游客旅游需求的虚幻想象。<sup>[14]</sup>可见，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除了长远科学的宏观政策和稳定可靠的

外部资本，更需要有机整合村民的主体参与和村庄的特色资源，尊重地方知识和民间智慧的时代价值。在成都“西控”战略规划的指导下，成都西郊诸多与 H 村类似的川西平原村落，便积极利用当地文化和生态优势激发村民参与休闲农业的热情，助推乡村绿色振兴。如郫都区唐昌镇先锋村在打造“农夫记忆”景区时，从当地“打平伙”<sup>③</sup>的生活习俗中汲取灵感，创造性地提出“村两委负责整治院落‘面子’”、村民负责做好院落‘里子’的权责分配机制，避免了因村两委大包大揽、唱独角戏而损害村民的主体参与性；<sup>[15]</sup>由都江堰市柳街镇红雄社区返乡创业能手宋建明在当地打造的“猪圈咖啡+川西音乐林盘”景点，将川西农耕文化、林盘景观和现代流行元素融入休闲农业产业链，运用“农业+”思维激活乡村固有资源，解决了附近 80 余名村民的生计问题。<sup>[16]</sup>

贺雪峰认为，随着村庄社会的多元化、地方性共识的逐步丧失、村民对村庄主体感的逐渐消退，乡土中国总体上从“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村民因缺少组织规约和认同归属呈现原子化面向。<sup>[17]</sup>相比于华南团结型村庄与华北分裂型村庄，在川西平原、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三省分散型村庄，农民的原生化程度更高，认同与行动单位收缩到家庭以内。但与此同时，分散型村庄由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高度离散，以及散居而广阔的开发空间，仍然可以通过量的扩张而非对内施加规范性压力来保持地方秩序，从而让各种理性利益行为获得较大伸张，因此蕴藏更多成长可能。<sup>[18]</sup>以 H 村为代表的川西平原村落，通过休闲农业中的村民参与和资源再生，逐渐探索出分散型村庄如何转化地方优势和乡土底蕴，摆脱村民原子化倾向、重建村庄共同体的成长路径，对我国分散型村庄的乡村旅游和文旅融合工作颇有启示。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不断总结与反思地方主体的行动逻辑和地方资源的再生机制，无疑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范水生, 朱朝枝. 休闲农业的概念与内涵原探[J]. 东南学术, 2011, (02).
- [2] 陈良兵. 休闲农业的多维思考[J]. 思想战线, 2017, (03).
- [3] 杨载田, 王志坚. 湖南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的寿文化主题探索[J]. 湖南社会科学, 2013, (05).
- [4] 杨大蓉. 基于地域文化的休闲性农业模式的探讨——以苏州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4, (06).
- [5] 张文明, 章志敏. 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 2018, (11).
- [6] 方志戎, 周建华. 人口、耕地与传统农村聚落自组织——以川西平原林盘聚落体系(1644~1911)为例[J]. 中国园林, 2011, (06).
- [7] 王习明. 村社公共服务与乡村建设——成都平原村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03).
- [8] 李永萍, 慈勤英. 村民小组：乡村治理的最小单元[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7, (05).
- [9] 赵旭东, 孙笑非. 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01).
- [10] 刘朝晖. 村落保护的空间规划与文化价值重构[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05).

---

<sup>3</sup>①在四川话中，“打平伙”就是指大家一起凑钱吃喝、费用平摊。

---

[11]彭兆荣. 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04).

[12]谢小芹, 周海荣. “水权一治权”: 丰水型社会中的水权运行机制基于四川成都夏雨村的实地调研[J]. 民俗研究, 2019, (05).

[13]谢小芹. 制造景观[M].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2015.

[14]邱硕. 城乡旅游想象与农业遗产实践: 对一个川西山村的调查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 2020, (02).

[15]张明海. 先锋村“变形记”: 村民和村集体合烹“九大碗”[N]. 四川日报, 2019-05-17.

[16]文弦. 打开平原之美成都描绘乡村振兴美丽画卷[N]. 四川日报, 2019-09-23.

[17]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修订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8]贺雪峰. 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 开放时代, 2012, (10).